

## 新中国成立70周年西南民族研究学术研讨暨《贵州民族研究》 创刊40周年办刊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综述

杨 凯 朱鹏程 郝天宇

2019年8月19—23日,由贵州省民族研究所主办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西南民族研究学术研讨暨《贵州民族研究》创刊40周年办刊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在贵阳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南开大学、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民族研究》、《北方民族大学学报》、《黑龙江民族丛刊》、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等全国100多所高校、科研院所、期刊的专家、学者近200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开幕式由贵州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巡视员蒙洪敏主持,贵州省委统战部副部长,贵州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石松江致欢迎辞,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张世保处长致辞,贵州省民族研究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颜勇研究员向与会专家学者介绍了贵州省民族研究院的基本情况。

第一,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定位与使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郝时远研究员从“共同体的中国理念与实践”出发探讨中华民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议题。他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如何解决文化差异和发展差距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也是中国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已经、正在和继续解决的问题。我们主张的包容多样、互利共赢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共同体的最佳选择。中央民族大学金炳镐教授指出,新中国70年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实现了阶段性飞跃。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创立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在新中国成立后有了丰富和发展;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时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发展和完善了这一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创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民族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新阶段。《民族研究》编辑部马俊毅编审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研究“多民族国家精神共同体”,指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内涵包括中国国家建构的文化哲学、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其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多元一体而形成中华文明为文化基础,以近现代史上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命运共同体意识”结合形成的“民族精神共同体”为思想基础,以中国共产党各民族平等、团结的理论、制度、政策与成就为政治基础。

第二,易地扶贫搬迁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吴大华教授指出,促进少数民族就业问题关乎少数民族群众民生保障、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也关系到各民族团结的社会基础和少数民族对国家认同的大局,要在立法层面不断完善少数民族就业促进机制。中央民族大学严庆教授指出,脱贫攻坚工作使得社会资源、人力供给、动员组织能力向基层下沉,执政党的影响力、组织力、引领力得以增强,在改变乡村贫困人口经济条件与经济水平的同时,促进了基层治理和社会建设水平的提升。庄晨燕指出,村庄是扶贫政策最终落地的场域,

也是分析政策实践困境生成和化解机制的核心切入点。王俊指出,农村文化扶贫事关乡村振兴战略,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事关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意义。左邱宇指出,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易地扶贫搬迁是民族地区解决扶贫问题的战略性选择,是为了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且要将其战略地位上升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高度来认识。

第三,人居环境改善与乡村振兴建设。贵州民族大学杨昌儒教授指出,农村饮水安全工作既是脱贫攻坚重要内容,也是重大民生工程。在开展脱贫攻坚中贵州省政府提出,要把解决饮用水问题作为“硬任务”和“最根本的民生底线”。贵州省农村饮水安全的主要做法是加强组织领导、规范建设管理、强化水源保护、提高水质保障、加大督促力度、完善考核体系等。中央民族大学宋才发教授指出,国家应该从制度上、经济上和秩序上为乡村的振兴提供保障,从而全方位带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要克服农民获取城市权利的“城乡二元结构”障碍,进而破解“宅基地制度”这一制约农民发展权的瓶颈。他进一步指出,要为乡村振兴建设提供规划安排,为乡村振兴用地提供制度支撑,为乡村振兴资金提供政府投入保障,为乡村振兴社会稳定提供安全秩序。吉首大学罗康隆教授从生态系统分区的得失利弊,作为生存策略的生计方式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文化、生态与生命的耦合循环三个方面进行研讨,指出人类事实上是自己建构了自己的生态位,当然同时也兼顾到了生态系统自身的规律,而且人类永远也不可能绕开这些规律。

第四,民族地区历史文献和考古研究。云南大学刘正寅教授指出,在文献中保存的民族历史资料极为丰富。一是在汉语文献中的甲骨文、金文等古籍资料中,有大量关于周边民族文化的记载;二是中国古代民族史志文献既包括数量巨大的汉文文献,也包括大量的少数民族语言文献;三是汉语文献中的多语种性,在民族史志的书写中语言较多,既有各民族现在使用的语言文字,也有古文字,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民族名物制度等的记载较多用少数民族语文的译写,也就体现了其多语种性。贵州大学杨军昌教授分别从黔西北自然地理与古彝文献中的生态环境、古彝文献对生态灾害的记载、黔西北人文地理与古彝文献中生态环境进行研讨,指出古彝文献中有许多生态保护与治理生态环境的经验,植树造林几乎是传统农耕社会试图修复生态的不二方式。他强调,当今生态理论主要关注生物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三个层次,保护生态在于控制生物三个层次内在系统的良性平衡发展。贵州省考古所周必素研究员从考古学角度探讨播州文化。他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向大家介绍“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指出黔北地区四神装饰经历了从墓室雕刻向腰坑里饰物遗存转变的过程,这与黔北地区墓葬装饰图案由宋至明逐渐简化的演变相一致,从贵州黔北地区四神乃至墓室雕刻深受川南地区影响的分布范围看,这一相似因素,仅仅辐射到贵州乌江以北地区,并形成完备的体系。

来自期刊界的与会学者还就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办好民族类学术期刊做了广泛的交流,并对《贵州民族研究》创刊40年来为民族研究、为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交流、为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理论政策、为贵州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所做的贡献做出了高度评价,并对《贵州民族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和刊物质量的进一步提升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作者杨凯,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朱鹏程,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硕士研究生;郝天宇,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硕士研究生。地址:贵阳市,邮编550025)

〔责任编辑 马 骏〕